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朱政惠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说明

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持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全书按时间顺序,精选 1918 年至 2008 年美国学者有关美国中国学的演讲、论文 22 篇,从中可窥见九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历史流变,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选录的 1918 年至 1970 年间的文章中,有 11 篇是首次译成中文,尤足珍视。

本书所收文章,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杂志,翻译亦出于多人之手,因而存在人物译名、注释格式不统一的情况。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全书人物译名做了统一。注释格式由于各文提供的信息完缺不一,难以做到统一,故基本上一仍其旧。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无论是新译稿,还是已经发表过的旧译稿,凡是能找到英文原文的,均对照英文原文进行了校核,作了更正和修订,特别是补充了一些旧译稿中原来省略的注释。

由于水平有限,付梓匆匆,书中舛误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其研究取向与研究

方法有很大的相通性。

海外中国学包容宽泛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单独穷尽其研究,所以对它的探讨,必须有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如果每个学科都能根据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深入对其相关领域的探讨,那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重要突破。

我们之所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只是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较长,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缘起及其主要成就,都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历史等人文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还是“二战”后的现代中国学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集中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探讨,尔后社会科学逐步介入,转入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态势。所以从历史学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尊重,也是针对性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手段。诚然,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仅仅从一个学科来把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渊博学识才有可能应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局势和研究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探索工作更具魅力而富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这项工作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翻译丛书已有不少,各家都有自己的用心和重点。参考诸家丛书发展特色,本丛书将把重点放在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上,包括对象国汉学史、中国学发展史的梳理、回顾和总结,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国学机构成就的探析和解读;当然,为了了解当前国际汉学发展前沿与思潮动态,也将重点翻译和推出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学术名著,包括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为后人留存史料、保持珍贵历史记忆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将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还将努力推出一些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和批判人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熄热情,衷心期望我们的努力成为通往成功之径的小小铺路石。

编者
2008年3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前言	朱政惠	1
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	赖德烈	1
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	赖德烈	8
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	赖德烈	18
美国的中国学	傅路德	35
美国中国学的未来	嘉德纳	45
美国的远东研究	卡梅伦	52
远东研究在美国：回顾与展望	赖德烈	69
扑朔迷离：美国的亚洲研究	费正清	78
关于美国中国学的一场学理探讨	列文森等	86
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傅路德	125
七十年代的任务	费正清	132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研究	吴文津	150
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黄宗智	163
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	刘广京	183
当前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趋势	艾 恺	204
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	何汉理	212
《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	柯 文	2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 年	裴宜理	254

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柯 文 261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 沙培德 282

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与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
 历程 费侠莉 318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卢汉超 327

附录

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 朱政惠 336

后记 346

前 言

在传统汉学研究方面,应该说,法国等欧洲的一些国家做得相当有成就;而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美国一直是独领风骚的。汉学和中国学是有区别的,学者们已有很多的论述。由于美国在世界中国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李学勤先生曾多次说过,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把握,这样才能深入和推进。我们自己研究的实践,也深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把握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起码需要做好两件工作:一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根据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方法,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展开对其研究历史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描述其大体的学术发展史,形成一个对中国学者有取鉴意义的科学成果;还有一个,就是做好对方学术史研究情况的探讨和资料整理工作,把美国学者对本国中国学发展情况的总结、反思工作一一揭示和整理出来,以利于中国学者更好地把握情况和开展研究。这两项工作都要做,齐头并进,这里所说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指后者。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每过一个时期,都会有史学家出来总结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在唐代,刘知幾撰写《史通》,完成了对此前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研究,提出了史家“三长”等重要史学理论和治史见解;在清代,章学诚以其重要著作《文史通义》,推进了刘知幾的成就,提出了通史研究的意义和经世史学的必要性,他还提出了史义为贵和“独断于一心”的问题。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视这类史学研究的专著。刘知幾、章学诚等学者倾其毕生努力,完成了对至他们那个时代的史学史、学术史的探讨,颇有重要发现和创意。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应该十分重视这一类总结文章的探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史上,一直有学者出来总结本国中国学研究的进程。他们回顾成就,总结利弊,提出新方法

新思路,探索未来走向。

比欧洲晚起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大概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随着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中国丛报》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的撰著,才有了其初步的成果,到 20 世纪初,有了一个小规模的进步。应该说,第一次比较集中的对中国学进程的反思,出现在 1920 年代,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多的,还数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先生,他是当时美国远东研究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至 1930 年代,他已经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即《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卷 138,1918 年)、《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美国历史评论》1921 年 7 月)、《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美国历史评论》1930 年 7 月)。他的这些回顾文章,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大背景(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谈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视野宽阔,见解独特。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虽然还不能说很大,而同时期的在美国的欧洲汉学家的成果更胜一筹,对美国中国学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探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必要性,从这一大格局出发呼吁学界重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学家应更多地关注中国,因为“它拥有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它的未来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命运紧密相连,它拥有至少三千年的优秀的历史文献记录,可能比其他种族相同时期的历史记录都更完整”。^{〔1〕}也许因为他是美国远东研究学会主席的缘故,他是当时美国最关注中国学的学者,是这方面总结文章写得最多的一位。他一直到晚年还在关注这一专题学术的发展。他所写的每一篇有关中国学研究的总结文章都内涵丰富,显示出他对此研究的极大关注和热忱,值得认真关注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学者反思总结美国中国学的重要高潮期。这时期撰写反思文章的作者有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等。卡梅伦的《美国的远东研究》(《远东季刊》1948 年 2 月)、傅路德的《中国研究的最新进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65 年 6 月)、费正清的《七十年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1969 年 2 月)、吴文津的《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研究》等,是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重要文章。这

〔1〕 见本书《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一文,第 17 页。

一时期的反思文章阐述的问题主要有：其一，对战时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总结。这些文章提到了战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研究的语言训练、机构设置、研究主旨等。卡梅伦的总结属于相当翔实的一篇，提供了很多重要历史信息。他写道：“美国卷入远东战争在美国公众的利益与态度中激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革命，大概没有其他任何研究领域受到如此深刻的影响。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些一直在美国学术生活边缘顽强挣扎的为数不多的远东专家成了国家的财富。”〔1〕他把这一时期远东及中国研究的重要历史背景揭示得十分清楚，强调了这一研究对美国远东战略及其发展的重大意义。其二，对新中国成立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中国学迅猛发展的情况回顾。这些总结文章更看重新中国成立因素的重大影响。一些研究文章明确写道：“推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巨大动力，则是1949年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的成立，就像之前的俄国革命促进了斯拉夫研究一样。发生在中国的巨变，使得我们有一种紧迫感要去理解那种变化的性质与意义。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美国政府加速了它的研究工作，以便能够跟得上中国的迅速变化。”〔2〕其三，对中国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结合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是当时面临的重要学术话题，美国中国学家做了十分深入的探讨。1964年由美国亚洲协会组织的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国学研究结合的讨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芮玛丽（Mary C. Wright）、墨菲（Rhoads Murphey）、牟复礼（F. W. Mote）、萧公权等学者都发表了重要见解。当时的学者强调，中国文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仅次于西方文明，其社会发展展现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对于人类社会研究有普遍意义，社会科学与现代中国学结合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史华慈在这一讨论中态度十分明确：“不管受过何种学科方法的训练，如果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他的通识教育——越广博深厚，就越能在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里发挥出所有的智慧。”〔3〕他反对学科“拜物教”，支持中国学研究的跨学科探讨。这都大大刺激了中国学研究的新变化。今天美国中国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及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的普遍和深入，与当时的这场讨论有密切关系。文献告诉了我们一切。

〔1〕 见本书《美国的远东研究》一文，第55页。

〔2〕 见本书吴文津著《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研究》一文，第151页。

〔3〕 史华慈：《学科“拜物教”》，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980年代以来到世纪之交,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及其他国际变动因素是其发展的重要背景,而美国和国际学术思潮的变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这三十年以及前此时期的总结和回顾文章就更多了,黄宗智、刘广京、柯文(Paul A. Cohe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学者都有过重要探讨。这当中,柯文教授的文章一直受到很大关注,一度成为中国学者了解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界碑。1980年代,他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专著,探讨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由“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演变过程,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变化;1990年代和世纪之交,他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趋势继续作了分析和探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他提到人类学对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问题,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研究的巨大冲击。同样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黄宗智从另外一个视角作了探讨和分析。他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三代研究专家:第一代以费正清、列文森等学者为代表,代表作是官方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第二代以施坚雅、孔飞力(Philip A. Kuhn)等学者为代表,注意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第三代以裴宜理、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学者为代表,主要进行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他认为第一代到第三代的重要变化在于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结合、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和多面化。他的这一“三代论”构成了美国学者对此学术史的又一新解说。关于1980年代以后的趋势,他认为,投入资金的收缩会使中国学研究有所影响,但又得益于新的动力——中美双方的学术交流,所以走向看好。^{〔1〕}裴宜理教授则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近50年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变化,她特别提到了跨时段、跨学科研究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此前跨时段的问题很难有突破。^{〔2〕}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中国女性史、性别史有很大的发展,关于这项研究兴盛的原因,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西方科学史在向所谓“情境中的科学”的转型中产生了对西方科学的经典理论以及社会体制研究的新的批判性思路,“新思路否定了将科学史作为西方所特有的进步来研究的错误传统,从而使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甚至文学研究者都

〔1〕 见本书《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一文。

〔2〕 见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美国学研究:50年》一文。

能进入到这个领域,来研究科学社团的文化以及塑造科学体制的权力结构。”〔1〕她分析了这个时代中国学发展所遇到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变异因素。在美国,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变化最大,而相关的反思总结和探讨文章也最多,给予我们的研究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基础。

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在很多基本方面是相通的。美国著名史学理论家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在他的著作中,曾对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作过论述,他认为史学史研究不应该是单纯叙述人、书与思想的历史,应该力求在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和研究环境中来探讨各史学流派产生、发展、存在的根源,使史学史成为社会史及文化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强调,“除非反映出历史写作的社会、政治和制度环境,如仅仅根据这门学科的内部发展,史学史是绝无可能为人理解的”。〔2〕他的见解可以解释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对美国中国学史的研究,应该将它的演变、递嬗放到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汉学、中国学受各时代思潮推动、制约的特点,决定了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的探讨十分重要。以上举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者对其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有其现实关照,注意中国学研究与当时社会、政治和制度种种关联的考察,绝非单从学术史内部发展考虑问题。这些探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中国学发展的成果和基本特征,成为了解这些时期中国学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和研究文献。

本论文集的整理工作已经有一段时期了。从编纂上讲,我们有几个基本注意的地方:一是历史的原则。文章的编排不是按门类或按问题,而是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这样,上起1918年,下迄2008年,使将近90年的美国学者对本国中国学研究总结和反思的足迹大体得以反映。这就有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考察和历史分析。其次是详今略远。我们不是为过去而研究美国中国学,而是为今天,为今天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今天美国中国学发展如何,有什么新方法、新思路,出现什么新人物、新成果,是我们尤其关心的。今天中国学术的发展不可能再隔绝于世界语境和海外中国研究兵团,不可能再作单边的思考而不顾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所以详今是必须的。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

〔1〕 见本书《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与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一文,第320页。

〔2〕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4页。

国学也是其形成以来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本文集这段时期文章收入稍多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此外有个兼容问题。我们收入了一些论西方中国学的文章,但其主要内容在美国;还考虑收有非美籍人士的文章,但其重要学术经历曾经在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有很大进步,对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成果翻译了不少,但比较而言,其学术发展史的探讨和研究还相对薄弱,相关的学术史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整理也欠缺。所以这一课要补上。应该认识到,了解、把握美国学者对自己走过道路的总结和反思成果,是我们进一步做好这一研究的重要前提。而且,研究生和有关专门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更多这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材料。编纂本文集的目的正在于此。

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还是有限的,客观条件使我们不可能把握历史上所有那些相关的重要文献,也不可能做到及时了解现今美国中国学研究中所有前沿动态及其成果。所以这个文集的编辑会有偏颇,会有遗漏或选篇欠当的问题,这就有待于今后的调整和改善。同样,在阅读和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应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这样涉及国际关系和文化交往的研究,美国中国学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国家立场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这就看我们如何把握了。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其间存在的问题,而不能照单全收。中国学者应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完整研究及科学批判和分析。^{〔1〕}

2000年,我受国家派遣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专注于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就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并期待能在不远的将来,完成一部由自己编辑的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的文集。作为这个想法的第一步,我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的论文,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我曾谈了五点意见:“(1)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研究方向的情况的总结、回顾和反思工作始终在进行,基本没有间断。(2)这些总结是我们开展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资料,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学发展的大体动向。(3)这些总结和回顾性质的文章,阶段性、时代性的特征非

〔1〕 为了促进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同时编辑了《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论文,作为这个论文集的辅篇。虽然还是一个初步的成果,需要补充和完善,庶几有助于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的探讨。

常明显,可以从这些文献和资料中把握每一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的中国学的进展状况,了解其主要学者、代表著作和理论思潮。(4) 这些材料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论反思类,这类论文和著作学术含量高,有的是数十年思考的结晶,堪称学术精品;二是一般总结回顾类,主要是适时性文章,不一定提出重要理论问题,但可以成为可贵的参考资料;三是评论类文章,比较多的是阶段性评论,文章不是很长,涉及问题不多,但往往很深刻。这类文章很值得关注。(5) 和美国丰富的中国学成果比较,回顾和总结类文章不能说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研究这些资料以切入美国中国学研究,颇有‘抓纲举目’之意。诚然,利用好、分析好这些文章和著作,中国学者的史识很关键。”今天看来,当时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五点意见还是正确的,而这些年里,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也算是本文的一个结尾吧!

朱政惠

2009年6月于沪上明日新苑

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

赖德烈^{**}

很难说中国历史这个研究领域对西方学术而言既有趣又很重要。但现有的其他国家都没有中国如此绵延不绝并能回溯到如此久远的时代。几乎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通过文化影响人类的很大部分,也几乎没有国家在这么多的世纪里统治了地球上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如此富饶的一片土地。现今没有这么了不起的民族,即使俄国人也不曾展现这么有趣的转型。我们也怀疑,任何其他国家的未来会比中国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会给全世界造成更大的危害或带来更大的福音。中国拥有更丰富的史料,完整地保留了她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更值得勤奋的学者开展研究。与邻国印度人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有历史感,留给后代大量材料,许多都经过仔细的、批评性的汇集,曾让西方的东方学家悲喜交加。

欧洲学者用了大约两个世纪逐渐意识到中国学领域的契机。应该说,对于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欧洲人没有根据不同的王朝和时期进行合理的分工对待,但欧洲人在向世界解释中国的发展方面起了个好头。法国从早期耶稣会士使团起,就不缺乏中国学的记载。近一百五十年,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通鉴纲目》译本已经出了十三册,但其《中国通史》并非完美无瑕。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翻译的司马迁的大作虽仍不完整,但精湛而细微。这期间有许多名人

* 本文原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卷 138, 1918 年。

**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曾任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美国远东研究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对汉学学者来说相当熟悉,还有法国连续出版的学术期刊如《亚洲杂志》和《通报》,是高标准出版物的重要佐证。上世纪许多英国学者为我们增添了对中国历史的西方式理解。如理雅各(James Legge)、伟烈亚利(Alexander Wylie)、庄延龄(Edward H. Parker)、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帕特南·威尔(Putnam Weale),这里提到的仅仅是几个相当著名的人物,他们因为向世界提供了有关中国遥远的过去和近来情况而将被永远铭记。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的期刊每年都给我们的资料库添加有用的补充。比起英法甚至美国,德国学界开展关于中国的研究是更近的事,但全世界都已受其恩惠。要说明日耳曼人的贡献是如何显著,只需指出一点,美国两位健在的最杰出的中国早期历史研究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和劳费(Berthold Laufer),都生于德国,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

从美国远东事务的立场出发,我们呼吁美国本土学者,特别是那些当代学者,在增进世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这方面,同欧洲兄弟相比即便不那么出色,至少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要落后很远。欧洲中国学原始资料主要来自领事馆和外交部门、中国海关中的外国职员及传教士团体。如今,美国领事馆在中国建立,在人员培训和学术水平上,还没有接近到值得与英国相比的程度。海关事务中,相比英国和欧洲大陆,参与其中美国人也并没有那么多。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传教士现在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多。他们在教育工作上出类拔萃,整体上的训练和能力水平都很高。当有人记得英国传教使团为中国历史学术提供的人才如理雅各、伟烈亚利、麦嘉温(John MacGowan)、苏慧廉(W. E. Soothill)、艾约瑟(Joseph Edkins)时,希望从美国传教士的名单中找出至少值得同等关注的名字。

但应该承认,从整体上考察美国历史学在中国史领域的作为,会产生失落感。只可看到两三个外交官和领事有发表文章的记录,大多数传教士看上去更关注他们组织、行政和宣传中的眼前问题,而没能花太多时间在学术研究领域。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尽管事实上愿意为几乎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开设适宜的课程,但对中国的关注却很不够。可能有三十个学校的教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中国主题,但通常只放在总课时一学期的远东概述课程里。只有三个学校有一些安排,可以对中国的语言、制度和历史进行细致研究。美国中国学如此的不足,以至三校中的两校不得不去欧洲征召人才充实学校的中国学教席。《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尽管保持了学术上的高标准,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中国史题材的文章,但在篇幅和流通上还没达到大西洋彼岸欧洲同类期刊的水平。

美国早年的中国学前景看似美妙。美国教会在华首批成员之一,精通中国语言和文献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博士,在其人生长河中历任传教士、外交官,最后在耶鲁大学做教授,他对增进外国有关中国的知识作出了显著贡献。他编的字典仍旧在用,其著作《中国总论》^{〔1〕}在40年前,甚至直到现在仍是和中国和中国文化最完美的调查。《中国总论》关于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他们那个时代优秀而合理的中国历史汇编,而后面的部分则为最好的外国学者所知。然而,卫三畏博士众多文章中的大部分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专题研究。很高兴啰嗦几句,卫三畏的儿子,即耶鲁大学的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教授,对父亲的著作做了很好的补充。卫斐列教授对《中国总论》的修订提供了帮助,他与父亲以及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共度了很多时光,发表了许多文章,教学生涯超过20年。作为对美国历史和远东当代问题进行更为认真研究的倡导者,有好几年他犹如在旷野中独自呐喊。正是由于这些,卫斐列教授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给予美国学者极大的惠赐。

卫三畏和另一位美国早期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牧师,是《中国丛报》的主要负责人。这份刊物1832年由裨治文开始出版,主要目的是在外国人中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至1851年停刊,从中可见到大量严格的历史性质的文章,题材涉及范围广泛。这些论文中如果有,也是很少,能算得上完全或最终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有贡献:它们本不如此。当时出版它们有实用的目的,然而,相较美国学界目前完成的工作,它们当时预示的前景似乎过于乐观了。

其历史功绩在量上接近卫三畏博士和裨治文先生的只有另一位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博士。丁韪良博士属于真正的老派传教士,尽管只是刚刚去世,宣告他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生涯的结束。在他的许多出版物中,1880年出版的《翰林集》最为历史学家喜爱。这是一本纯粹的研究集,一些文章先前已发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对古代中国国际法的描述,这是他培养中国外交官时引发的兴趣。他还有两本好书:《中国之觉醒》(纽约,1907年)和《北京之围》(1900年出版)。但丁韪良博士只在一定意义上是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永久的贡献主要是其他方面的任职。实际上可以说,现在这一代所有的美国传教士都同样令人相当失望。只有少数几个人的贡献足以作为历史学家被人铭记。上海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校长提供了一本杰出而广泛

〔1〕 1848年第1版,1883年最后一次修订出版。

使用的《中国历史》^{〔1〕}，但相当概括简练。方法敛(Frank H. Chalfant)牧师对早期中国书法作品做了重要的收集，并写了一篇颇有价值但短小的论文，^{〔2〕}还有一篇关于秦朝度量衡的更为短小的文章。^{〔3〕} 牧师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博士通过个人观察叙述了义和团起义，有相当的价值。^{〔4〕} 他的《中国人的素质》^{〔5〕}和《中国乡村生活》^{〔6〕}两本著作对中国生活的研究，可能对未来研究者有价值，毕竟那时的境况正在迅速消逝。还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John C. Ferguson)博士的一篇有趣的论文，有关宋朝伟大的激进改革家——王安石。^{〔7〕}

即使在受过理论训练的学者最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家和宗教史方面，美国传教士已出版的著作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亨克(F. G Henke)博士近来为我们贡献了王阳明著作的极好的译本，王阳明的思想在日本德川时代影响很大。然而这是唯一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著作。现已交给保罗·卡洛斯的 Open Court 出版社出版，并由此引出亨克作品的出版，他为我们提供了《道德经》^{〔8〕}的英译本以及中国思想^{〔9〕}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

我们的外交官和领事看起来与传教士一样毫无历史天赋。值得一书的仅有三人。但这三位的优秀著作弥补了他们许多同事留下的空白。威廉姆斯(E. T. Williams)博士进行了两到三项研究，使我们期望他可能有更多的闲暇从事此类研究。^{〔10〕} 已故学者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凭借其著作的博学和细致，在一流的中国学学者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留下其他短篇研究：《西藏典籍中记载的佛陀行迹及其教团早期史——以及西藏和于阗早期历史介绍》(伦敦，1884年)；《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发表于美国历史学会的《评论》第2卷^{〔11〕}；《中朝之

〔1〕 最新版，上海，1915年。

〔2〕 载于卡内基博物馆《论文集》，第4卷，1期，1906年9月。

〔3〕 Journ. N. C. B. Roy. As. Soc.，35卷(1903—1904)，页21—25。

〔4〕 《骚乱中的中国》。

〔5〕 上海，1890年。

〔6〕 F. H. Revell 出版社，1899年。

〔7〕 Journ. N. C. B. Roy. As. Soc.，35卷，页65—75。

〔8〕 《老子道德经》，芝加哥，1898年。

〔9〕 芝加哥，1898年。

〔10〕 《洪武及其都城》，Journ. N. C. B. Roy. As. Soc.，第26卷，2期，1891—1892年，页42—174；《中国刑典的魅力》，Journ. N. C. B. Roy. As. Soc.，第28卷，2期，页61—69，1901年。

〔11〕 《美国历史评论》，第2卷，页427—442，627—643。